



敦煌莫高窟第61窟中的《五台山图》研究

肖 雨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敦煌莫高窟第61窟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着人于五代后晋天福十二年(947)六月十五日凿成, 而其内的《五台山图》粉本, 则是以敦煌画院的艺师为主, 于后汉天福十二年(947)九月绘成。

关键词 永昌之县; 曹元忠夫妇; 画院; 传说故事; 《五台山图》

中图分类号 B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6176(2008)04-0046-09

第61窟位于莫高窟南区中段最下层, 主室为覆斗形顶, 窟顶藻井中央饰团龙鹦鹉图案, 四披画千佛, 四披中间分别绘四方佛, 窟顶四周绘四大天王。窟室中央置佛坛, 坛后背屏直达窟顶。据敦煌研究院专家说, 佛坛上原有骑狮文殊及其侍从塑像, 现在大部已毁, 仅存文殊坐骑狮子的一只前蹄和背屏上残留着的狮子尾巴, 故该窟亦称文殊堂。文殊堂正壁绘《五台山图》, 南壁从西至东依次绘“楞伽经变”、“弥勒经变”、“阿弥陀经变”、“法华经变”、“报恩经变”。北壁从西至东依次绘“密严经变”、“天请问经变”、“药师经变”、“华严经变”、“思益梵天请问经变”。东壁画“维摩经变”。南、西、北三壁下部以联屏形式绘“佛本行经变”, 南、东、北三壁下部共绘供养人49人、供养比丘3人。甬道经西夏重修后, 绘有炽盛光佛。该窟容积颇大, 是敦煌石窟中最大洞窟之一。该窟内容丰富, 不仅展示了五代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

成就, 而且也反映了唐、五代时期佛教圣地五台山地区的历史地理、佛教文化和社会经济生活风貌, 还反映了五台山文殊信仰的流布情况, 具有极其珍贵的历史地理价值和文化艺术价值。

(一) 五代时归义军曹元忠开凿莫高窟第61窟

唐德宗贞元(785—805)之后, 敦煌郡陷于吐蕃。《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请求》载:

穆宗长庆四年九月甲子, 灵武节度使李进诚奏, 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山在代州, 多浮图之迹, 西戎尚此教, 故来求之。

史载贞观八年(634), 西藏遣使朝贡, 和唐朝始有往来。贞观十五年(641), 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妻赞普松赞干布, 而文成公主带去了一尊12岁的释迦牟尼等身像, 由此揭开了藏传佛教和佛像艺术发展的序幕。松赞干布“叹其大国

收稿日期: 2008-07-06

作者简介: 肖 雨(1942-)男, 山西省忻州人,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 主要研究佛学。



礼仪之美”，“慕华风”，^[1]遂选送豪酋子弟至唐，“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字之人，典其表疏”。^[2]从此，唐朝文化传入吐蕃。大历元年（766），“没蕃将士僧尼等沙州凡八百人”。^[3]沙州佛教传入吐蕃。《佛祖统纪》卷第41载：建中二年（781），唐朝正式“遣僧良秀、文素二人行，每人岁一更之”。从此，唐朝佛教正式传入吐蕃。良秀为山西中条山柏梯寺僧人，后入京师，与去过五台山的般若三藏同住西明寺。可见，良秀是把五台山佛教信息最早传入吐蕃的僧人。时隔43年的长庆四年（824），吐蕃始遣使向唐朝求取龙朔二年（662）会稽和张公荣所绘的《五台山图》小帐。从此，《五台山图》就传入了吐蕃，即今西藏和敦煌一带。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张义潮率众推翻吐蕃政权，占领了河西沙、瓜等11州。大中五年（851），张义潮降唐，唐王朝任命张义潮为归义军节度使，镇守河西沙、瓜等11州。敦煌的历史进入了归义军时期。唐朝末期，国势衰微，无力顾及西部地区。后梁开平四年（910），张义潮之孙张承奉建立了西汉金山国，自号白衣天子。乾化四年（914），曹议金取代了张氏政权，恢复了归义军旧称，仍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同光二年（924）五月，“回鹘来朝，沙州留后曹议金亦遣使附回鹘以来，庄宗拜议金为归义军节度使、瓜州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统治了河西沙、瓜等11州。后“晋天福五年，议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来。周世宗时，又以元忠为归义军节度使，元恭为瓜州团练使”。^[4]曹氏政权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正式承认，直到宋仁宗时亦封爵不绝。

曹氏政权不仅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承认、支持，而且又与东面的回鹘、西面的于阗建立了联姻关系，遂使其保持了长时间的和平安定局面，统治了敦煌地区130年之久。这就保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敦煌地区的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曹氏政权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赞扬。

曹氏政权不仅对外修好，对内还利用佛教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曹议金认为佛教为“圣力”，要想安定社会，就要“虔诚佛理，仰仗慈门”。所以，他在《曹议金礼佛疏》中曰：要“请本尊于衙庭，结净坛于大厦”，邀僧侣“开贝叶之金文，诵真言之宝偈”。在衙庭设坛诵咒，讲经说法。尊崇佛教，弘扬佛法。议金之子元德、元深、元忠继承父业，绳武父好，也“广崇释教，固谒灵岩，舍珍财于万像之前，炳金灯于千龕之内”。于是，沙州境内竟有120余座寺庙，千余位僧尼。晨钟暮鼓，经声不绝，香烟缭绕，法会不断，佛教相当兴盛。这还因为，敦煌是丝绸之路的要冲、东西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交汇的重镇。史载，宋乾德二年（964），洛阳天寿院高僧继业等300余人，奉太祖之命自阶州出塞，经瓜、沙等州，去天竺求取舍利及贝多叶经，就曾经经过这里，回来时还将所抄经书献给曹元忠。印度那烂陀寺普化大师自中印度至五台山巡礼时，来回都经过敦煌，且把逐日游礼五台山寺庙的记载留在了敦煌，即现存的P.3931《印度普化大师五台山巡礼记》。再是P.397号遗书载，敦煌的一位僧人，自戊寅岁从沙州出发，由朔州经雁门关入代州，游历圆果寺后到忻州，游历了仁泽、铁佛诸寺，于2月20日到达五台山，住了10余年后，于辛卯岁返回沙州。这些都反映了中印、西域、于阗、敦煌一带僧人朝礼佛教圣地五台山和崇拜文殊菩萨的热情，也说明了五台山文殊信仰在敦煌的流布盛况。这是因为，文殊是释迦牟尼的左胁侍，是专司智慧、辩才无碍、具有护国佑民思想的大菩萨，是佛教知识分子的代表，而隋唐五代又是一个崇尚文化的时代，所以帝王宰臣、文人学士都崇奉文殊，希望自己也具有文殊菩萨的智慧辩才，得到高官厚禄，维护好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就



信仰文殊,供奉文殊,为文殊大兴土木,建寺凿窟,绘制经变和五台山图。据统计敦煌石窟就有《文殊变》132幅、屏风画形式的《五台山图》11幅,曹元忠还专门开凿了颇大的第61窟文殊堂,绘制了巨型《五台山图》。

那么,第61窟文殊堂是何时开凿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学人多有研究,一说第61窟文殊堂凿成的年代是公元947—951年间;二说第61窟创于五代宋初;三说这个窟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时开创,其时代为北宋初期无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众说纷纭,莫衷于是。那么,怎么办呢?我看还是从《五台山图》中的榜题所示史料着手研究为宜。在那诸多榜题中,我认为“永昌之县”这条非常重要,因为它作为县名的时间较短,倘若跨越其时限的话,就不会标其名了。《畿辅通志》卷14“行唐”条说:

周时赵南行唐邑,汉置南行唐县,属常山郡,为都尉治。后汉仍属常山,晋因之,后魏曰行唐县。太和十四年置唐郡,二十一年郡废,仍属常山郡,隋因之。唐属恒州,五代梁开平二年,又改曰章武,唐同光初复旧。晋改曰永昌,汉复旧。宋属正定府,金因之。元初改属保定路,明属正定府。本朝因之。

由此可知,五代晋的永昌县,就是后魏置的行唐县。那么,五代晋在何时将行唐县改为永昌县呢?《旧五代史》卷81《少帝纪第一》载:

[天福七年]秋七月癸未朔,百官素服临于天清殿。戊子,诏应宫殿、州县官名、府号、人姓名,与先帝讳同音者改之。

因行唐县之“唐”与先帝“敬瑭”之“瑭”同音,故于天福七年(942)七月癸未(一日)将“行唐县”改为“永昌县”。

那么,在五代后汉的何时又复名“行唐县”呢?《旧五代史》卷100《高祖纪下》载:

[天福十二年]六月戊辰,制:“大赦天下。应天福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昧爽已前,天下见犯罪人,已结正未结正,已发觉未发觉,除十恶五逆外,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宜以国号为大汉,年号依旧称天福”云。

又案《欧阳史》说:“六月戊辰,改国号汉,是戊辰以前犹未改国号也。”六月戊辰即六月十五日。此日是后汉废“永昌”,改为“行唐”的最早时间,也当是窟主凿成第61窟的最晚时间。那么,窟主是谁呢?请看下文。

(二)第61窟中的五代《五台山图》

沙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曹元忠在五代后晋时开凿的第61窟佛坛中央,原有一组文殊骑狮大型彩塑,可惜已毁,仅留下一只狮蹄、狮尾。但它也反映了五台山文殊信仰在敦煌、于阗一带的盛行。事实上,此时曹氏统治者还刻印了大量的文殊画像,在敦煌、于阗一带流传,也说明了这一问题。

在文殊彩塑的背面,即61窟的正壁(西壁)还绘制了一幅长13.45米、高3.42米,面积达45.999平方米的巨型山水画,作为文殊菩萨的背景。该画详细地描绘了从山西太原经五台山至河北镇州(今河北省正定县)800余里范围内的山川形势,其中还画出了大大小小的村庄城镇、寺庵殿塔等200余处建筑,其间有高僧说法、信徒巡礼、著名史迹和各种各样的灵异瑞相等。按谢保生、凌云编著的《敦煌艺术之最》说,《五台山图》中有寺院、庐庵、兰若、凉亭、城池、房宇等建筑199处、桥梁13座、佛菩萨画像20身、僧俗人物428人、乘骑驼马48匹、运驼13峰。其中,清晰可辨的榜题按195条计,其中灵异瑞相46条,寺庵兰若85条,宝塔15条,地名32条,巡礼送供者12条,其它5条。若按画图内容的布置来看,全图可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主要是各种菩萨赴会和诸天、罗汉、天



龙等化现的灵异瑞相,中部是五台山的五座台顶和其间的著名寺院,下部是由太原经忻州等地到五台山,或由镇州经永昌县、阜平县到五台山的道路等历史地理情况,是一幅五台山地区的鸟瞰图。其规模宏大,构思精密,内容丰富,布局适当,是一幅翔实细致的历史地理图、佛教史迹图和美丽的山水人物画。

那么,这幅《五台山图》又是何时绘制成的呢?

一般说来,第61窟凿成的年代——后晋天福十二年(947)六月十五日,当是开始绘制《五台山图》的年代。又,在第61窟南壁第3位供养人像侧有一题记为:“施主敕授浔阳郡夫人翟氏一心供养。”据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主编的《莫高窟第61窟》中说:“施主就是窟主,这时的翟氏正是曹元忠的夫人翟氏。”《五代会要》卷14“司封”条载,后汉“天福十二年九月”规定,留守节度使妻可封为郡夫人。而这年正是曹元忠自称节度使之年,也是敦煌石窟和敦煌遗书中最早出现“浔阳郡夫人翟氏”之年,故曰敦煌莫高窟第61窟为曹元忠夫妇着人于后晋天福十二年(947)六月十五日那天凿竣。窟主是曹元忠夫妇。而绘成《五台山图》粉本的时间,为后汉天福十二年(947)九月。因此说,敦煌《五台山图》是一幅五代后汉时期的《五台山图》。

那么,这幅《五台山图》的粉本是如何来的呢?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不仅是一位万行圆修、自利利他、宅心法界、协助释尊弘扬大乘佛法的菩萨,而且还是早已成佛的“诸佛之师”。后秦鸠摩罗什译的《首楞严三昧经》卷下载:

(佛对迦叶)说 过去久远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尔时有佛……谓平等世界龙种上佛,岂异人乎?勿生此疑。所以者

何?即文殊师利法王子是。

这就是说,文殊是过去久远劫时,平等世界的龙种上佛。

唐代义净法师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卷第3《进药方法》中又说:

神州……异物奇珍,咸萃于彼,故体人象物,号曰神州。五天之内,谁不加尚?四海之中,孰不钦奉?云文殊师利现居其国。所到之处,若闻是提婆弗咄捋僧,莫不大生礼敬。提婆是天,弗咄捋是子,云是支那天子所居处也。

这就是说,文殊是神州(支那)的天子。天子即是帝王。

同书卷4《西方学法》中又载:

西方赞云:曼殊室利现在并州,人皆有福,理应钦赞。

唐初,五台山属于太原,太原亦名并州。所以,唐太宗于贞观九年(635)诏曰:

五台山者,文殊闍宅,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尤当建寺度僧,切宜祇畏。是年,五台山建寺十所,度僧百数。^[4]

鉴于文殊师利既是出世的佛、菩萨,还是入世的大唐帝国的国王。所以,深受唐代诸帝的尊崇敬仰,他的道场五台山也就受到尤加礼遇,五台山佛教也就受到特殊照顾。高宗诏谕“五台山等圣道场地僧寺,不得税敛”。^[5]武则天敕建五台山清凉寺、琢玉文殊像送与清凉寺;命德感国师为僧统,住清凉寺,掌管京国僧尼事;派人至五台山探菊采花;于各台顶敕建铁塔;令会稽和画师张公荣等至五台山检寻圣迹,会稽还撰《清凉山略传》1卷,张公荣还绘了《五台山图》小帐,广行三辅;又显庆设斋,万圣赴会。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加强了对五台山的管理、宣传和支持。“代宗广德元年十一月,土番陷京师,帝在华阴,文殊现形,以狄语



授帝。及郭子仪复京师,驾还长安,诏修五台山文殊殿,铸铜为瓦,造文殊像,高一丈六尺,镀金为饰。”^[6]永泰元年(765),令不空三藏创建五台山金阁寺,重修玉华寺和六处普通供养舍,令僧人常转《仁王经》、《密严经》、《法华经》等护国三经,使五台山成了大唐王朝的镇国道场。大历五年(770),又令全国寺院都建文殊院,供文殊像,寺院食堂中都把文殊像置于宾头卢上首,还把普贤、观音、地藏列于其后,这就又使五台山成了“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全国文殊信仰中心”,大大推广了文殊信仰。总之,“大唐始太宗,至德宗,凡九帝,莫不倾仰灵山,留神圣境。御札天衣,每光五顶,中使香药,不断岁时。至于百辟归崇,殊邦贡供,不可悉记”。^[7]五台山成了中国佛教的“首府”、与印度灵鹫山媲美的“世界佛教圣地”、“世界佛教的文殊信仰中心”。因此,作为佛教圣物的《五台山图》,以满足广大信众的需要,便应运而生。

《五台山图》就是绘有五台山自然地理和佛教寺院、瑞相灵迹的佛画。最早的《五台山图》是会稽和张公荣等于龙朔二年(662)绘的东传河北、西达三辅的《五台山图》小帐。其次是神英在法华寺画的“五台山十寺血脉图”、道义画的《金阁寺化现图》,复次就是圆仁于开成五年(840)在太原请画博士画的《五台山化现图》,其四就是敦煌遗书P4648号载的敦煌僧人至五台山朝山拜佛后在太原画的《台山图》长画。就是这些信众在朝山览胜后,又求得《五台山图》作为朝圣纪念品,带回住地,有的收藏,有的送人,遂使《五台山图》传到汉地、西域、韩国、日本等地。

那么《五台山图》何时传入敦煌呢?

前面说过,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会稽和张公荣所绘的《五台山图》小帐就传入了吐蕃。吐蕃是我国古代藏族政权的名称。在赞普松赞干布(617—650)时,降服苏毗、羊同等部,定都

拉萨,建官制,立军制,定法律,创文字,形成了以赞普为中心的奴隶制政权。到赞普墀松德赞在位时(755—797),吐蕃最为强盛,曾西攻大食,南入天竺,占有青藏高原、西域和河西、陇右等地区。从唐德宗贞元(785—805)之后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张义潮推翻吐蕃政权这40余年间,敦煌就属吐蕃管辖。因此说,长庆四年(824)吐蕃遣使求取的这幅《五台山图》也传到了敦煌。从敦煌莫高窟第159窟、222窟、237窟、361窟和112窟这中唐五窟帐门两侧或屏风上画的《五台山图》看来,它们的粉本,就是源于龙朔二年(662)会稽和张公荣绘的《五台山图》等上述几图,当然不是照猫画虎,而是一次比一次有所创新。综合观察这些《五台山图》,其主要内容为:五台山的五座台顶、空中化现的骑狮文殊、佛寺佛塔、朝山大道、小桥流水和朝山拜佛的僧人居士等等。由此看来,五代后汉时这幅《五台山图》的粉本是源于山西五台山和太原所绘的《五台山图》。不过它的资料一是源于《古清凉传》,二是源于《广清凉传》中五代后汉之前的材料。三是源于《诸山圣迹志》或西域、敦煌等地僧俗瞻礼五台山后所作《行记》之类的史料。

《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六十一窟(五代)》说:

为了营造石窟,曹氏政权还效仿中原及前后蜀,设立了画院,画院有“都勾当知画院使”、“知书手”等职……而沙州的画院则是供奉敦煌曹氏的机构……除了官府的画院外,沙州还有民间性质的“画行”……画行成员也有在官府供奉的义务。

五代时期敦煌一带的统治者曹氏政权,为了营造石窟,雕塑佛菩萨等圣像和绘制佛教图画,不仅设立了画院,画院还根据塑画水平的高低,设制了“都勾当知画院使”、“知书手”等职,如曹元忠时期榆林第33窟就有“清信弟子



节使押衙□左厢都画匠作银青光禄大夫白般涩一心供养”、莫高窟五代第129窟还有“子婿衙前正兵使兼绘画手银表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试殿中监张弘恩□永□一心供养”等题记,画行中也有画师、画匠、学徒弟子等不同等级,这些艺术人员就是为曹氏统治者塑画的艺人。根据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的绘画水平和画风看来,这幅巨型的《五台山图》很可能就是这部分艺师中的精英根据上述的《传》、《志》、《行记》的史料和《五台山图》的粉本而绘制于第61窟的墙壁上的。当然也不完全排除此画院、画行之外的个别艺术大师参加绘制这一流传至今的《五台山图》。

那么,文殊骑狮像的渊源呢?

宋代大华严寺坛长妙济大师编的《广清凉传》卷中的《安生塑真容菩萨》条说:

大孚灵鹫寺之北,有小峰,顶平,无林木,岿然高显,类西域之鹫峰焉。其上,祥云屡兴,圣容频现,古谓之化文殊台也。唐景云中,有僧法云者,未详姓氏,住大华严寺。每惟大圣示化,方无尊像。俾四方游者,何所瞻仰?乃缮治堂宇,募工仪形。有处士安生者,不知从何而至。一日应诏,为云塑像,云将厚酬其直,欲速疾工。生谓云曰:“若不目睹真像,终不能无疑。”乃焚香恳启。移时,大圣忽现于庭,生乃欣踊蹶地,祝曰:“愿留食顷,得尽模相好。”因即塑之。厥后,心有所疑,每一回顾,未尝不见文殊之在傍也。再期工毕,经七十二现,真仪方备。自是灵应眈眈,遐尔归依,故以真容目院焉。

唐睿宗景云年间(710—711),大华严寺僧人法云在五台山灵鹫峰化文殊台上兴建了一座菩萨堂,他想塑一尊文殊化现圣像,满足游观之士对五台山和文殊菩萨的崇拜和信仰。但自南北朝以来,文殊菩萨形象一直是作为释迦

牟尼的胁侍菩萨与普贤菩萨一起出现的。隋代之后,文殊菩萨又是以和维摩诘居士辩论者的形象出现的。五台山没有一尊作为主尊的文殊圣像做参照,就是招募来的具有相当道艺的居士安生也未曾见过此种圣像,无法动手塑造。怎么办呢?他们以宗教的虔诚焚香恳祈,愿文殊化现真容,照样塑造。果然,至诚所感,“大圣忽现于庭”、“得尽模相好,因即塑之”。“经七十二现”,文殊真仪方才塑毕。自此,遂把菩萨堂所在寺院改名真容院。真容院,就是现在的菩萨顶。

那么,文殊真仪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呢?

据开成五年(840)至五台山巡礼求法的日本高僧圆仁慈觉大师说:

(五月十七日)晚际,与数僧上菩萨院,开堂礼拜大文殊菩萨像,容貌颀然,端严无比。骑狮子像,满五间殿。其狮子精灵,生骨俨然,有动步之势,口生润气。良久视之,恰似运动矣。老宿云:“初造此菩萨时,作了便裂。六遍祖作,六遍颓裂。其博士惆怅而云:‘吾此一才,天下共知,而皆许孤秀矣。一生来祖作佛像,不曾见裂损之。今时作此像,斋戒至心,尽自工巧之妙。欲使天下人瞻礼,特为发心之境。今既六遍造了,六遍皆摧裂,的应不称大圣之心。若实然者,伏愿大圣文殊菩萨为我亲现真容,亲睹金颜,即仿照而造。’才发愿了,开眼见文殊菩萨骑金色狮子,现其人前。良久乘五色云,腾空飞去。博士得见真容,欢喜悲泣,方知先所作不是也。便改本样,长短大小,容貌仿佛。取所现之相,第七遍祖作此像,更不裂损。每事易为,所要者皆应矣。其人造此像了,安置此殿。露光,眼中注泪,乃云:‘大奇!从来未曾见者,今得见也,愿劫劫生生常为文殊师利弟子。言竟身亡。’向后,此像时时放光,频



现灵瑞。”

从上述两段引文看来，在唐景云年间（710—711）之前，五台山还没有文殊骑狮圣像。换句话说，五台山把文殊菩萨作为主要的崇拜对像是从唐代景云年间安生塑造了骑狮文殊像后才开始的。这也就是敦煌写卷S.529所说的自安生塑文殊菩萨像后，才开始流行画文殊菩萨骑狮像。这从中国佛教史来看，安生于唐景云年间（710—711）塑成的文殊骑狮像，是在武则天遣使于阗取回八十《华严》，着于阗三藏实义难陀法师在洛阳佛授记寺，于圣历二年（699）十月八日译出此《经》后的12年。这说明了八十《华严》的编辑之地——于阗的文殊信仰又一次传入了中原乃至五台山，文殊菩萨的地位此时又上升了一大步。

在此，我还想顺便说明一下“文殊五尊像”的来源。

文殊五尊像是骑狮文殊和其侍者善财童子、驭者于阗王，及其佛陀波利和化文殊（圣老人）。这五尊像是根据宋代时大华严寺的坛长妙济大师所撰的《广清凉传》卷中的两个传说故事来的。其一《菩萨化身为贫女》载：

大孚灵鹫寺者，九区归响，万圣修崇。东汉肇基，后魏开拓。不知自何代之时，每岁首之月，大备斋会。遐邇无间，圣凡混同。相传者，有贫女，遇斋赴集。自南而来，凌晨届寺。携抱二子，一犬随之。身无余赀，剪发以施。未遑众食，告主僧曰：“今欲先食，遽就他行。”僧亦许可，命僮与馔。三倍贻之。意令贫女、二子俱足。女曰：“犬亦当与。”僧勉强复与。女曰：“我腹有子，更须分食。”僧乃愤然语曰：“汝求僧食无厌，若是在腹未生，曷为须食？”叱之令去。贫女被诃，即时离地，倏然化身，即文殊像，犬为狮子，儿即善财及于阗王。五色云气，霭然遍空。因即留苦偈曰：“苦瓜连根苦，

甜瓜彻蒂甜。是吾起三界，却被可师嫌。”菩萨说偈已，遂隐不见。

这则优美的传说故事，起源于五台山大华严寺正月举行的无遮大会上。贫女为腹子争食而被主僧呵斥一事，其宗旨是教育僧人要具有“贵贱等观，贫富不二”，即“众生平等”的文殊思想。这里有趣的是贫女化成了文殊菩萨，犬化成了狮子，二子化成了文殊侍者善财童子和驭者于阗王。这说明了武则天遣使于阗国王求取的八十《华严》已传入了五台山。以八十《华严》是在洛阳佛授记寺于圣历二年（699）译出，故曰该故事的起源当在唐代圣历二年（699）之后，不是有些人说的北魏时代。复次，以善财童子受文殊菩萨指点，参访了53位善知识后得道的；于阗王是尊崇大乘、崇奉《华严》、批准八十《华严》送与唐代武则天之主。所以，二子化现成了他们二位。此骑狮子文殊和善财、于阗王之图或塑像，称为新样文殊。这一“文殊三尊像”早在北宋时已传入日本，现藏于日本天桥山智恩寺文殊堂、清凉寺等处。

其二《佛陀波利入金刚窟》曰：

佛陀波利者，唐言觉爱，北印度罽宾国人也。亡身徇道，遍观灵迹。闻文殊师利在五台清凉山，远涉流沙，躬来礼谒。以唐高宗大帝仪凤元年至台山。南陟思阳岭，见林木干云，景物殊胜。内心忻怿，五体投地，向山顶礼曰：“如来灭后，众圣潜灵。惟有大圣文殊师利于此山中，汲引群生，教诸菩萨。波利所恨生逢八难，不睹圣容，远涉流沙，故来礼谒。伏乞慈悲普覆，令观尊仪。言已，悲泣泪流，向山顶礼。礼已，忽见一老人，从山中出来，作婆罗门语，谓波利曰：“师情存慕道，追访圣迹。不惮劬劳，远寻灵异。然汉地众生，多造罪业。出家之士，亦多犯戒律。子西土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能灭众生恶业，未知师将得此《经》



来否？”波利报曰：“贫道宜来礼谒，不将经来。”老人曰：“既不将《经》，徒来何益？纵见文殊亦不识。师当即回，取此《经》至，流传斯土。即是遍奉众圣，广利群生，拯济幽冥，报诸佛之思也。师如取得《经》本来，弟子即示师文殊所在。”波利闻得此语，不胜喜跃，遂裁抑悲泪，至心礼拜。举头之顷，不见老人。僧大惊愕，倍更虔诚，比志捐生。复还西域，求《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至永淳二年回至长安，具以上事闻奏。高宗大帝遂留《经》入内，请日照三藏法师及敕司宾寺典客杜行顼等译唐本。敕赐绢三千疋，《经》遂留内中。波利泣奏曰：“……‘请还《经》本流行’……帝还僧梵本……波利访得通梵语唐僧顺正，奏共翻译……译讫，波利持本，再至五台山。相传入金刚窟，于今不出。”

这一故事流传甚广，影响极大。因此，晚唐时候就有人把这两个故事的人物内容相结合，创作了“文殊五尊像”图画和塑像。这又是一个创新。此“文殊五尊像”画像早在北宋雍熙三年，即日本花山天皇宽和二年(986)七月就被日本僧人奝然一行请回了日本。现藏于日本遍明院、竹林寺本堂、唐招提寺、生驹竹林寺、国立博物院、兴福寺劝学院等处。而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中，尚存有金代塑的“文殊五尊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殊五尊像”彩塑。

前面说过，文殊骑狮这一形象是安生根据文殊化现的形象塑的。安生何许人也？据法国高等实践研究宗教部博士生张惠明说，他很可能是来自中亚阿姆兴锡尔河一带昭武九姓的粟特移民。“文殊骑狮这一佛教图像的创作受到了杰特艺术的影响，甚至在这一图像的源头上可以追溯到中亚粟特地区的娜娜女神骑狮图像上”。^[8]它说明了西域、中亚与中原、五台山文化的相互交流。敦煌遗书P4049的“骑狮文殊

和佛陀波利见文殊化老人”白描图也反映的是此事。白描图中，给文殊牵狮子的是于闐王，端盘果的是善财童子，合掌的是佛陀波利，竖起右手的是文殊化老人。这一种图叫文殊五尊像。它随着文殊信仰的流布，传到了日本、美国、法国、俄国等地区和国家。

那么《五台山图》的内容及其意义如何呢？

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在《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中说：

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可以说是一幅山水人物画，也可以说是一张百卉画，其图间更布满了大小寺院（楼台界画）、传说故事，以及高僧说法、信徒巡礼等图像，而图的下方又是从太原经五台到镇州的鸟瞰图。所以它不仅给五台山历史补充了好多空白，并且也给我国建筑史、艺术史、佛教史和当时的服饰习尚等各方面都提供了崭新的史料。

《五台山图》不仅是一幅大型的佛教史迹图，而且亦是一幅大型的山水人物画。它的绘画水平反映了敦煌五代时期的艺术成就。

五台山不仅是一座巍峨敦厚、五峰耸立、万山重重、河流滚滚、风景优美、气象万千的名山胜境，而且又是一座寺庙林立、宝塔穿云、灵迹点点、僧尼众多、香烟缭绕、经声不断的佛教圣地。因此，画师们就紧紧抓住这两大特点，谋篇布局，组织画面。上面是五台山这一佛教圣地的各种灵异瑞现，中间是五座台顶及其间大大小小的寺庵兰若、宝塔圣众，而下面则是由太原、镇州通往五台山的交通路线及其社会生活景象。同时，他们又以五台山的中台顶及其大华严寺为中轴线，右面安排了南台、西台及其间寺庙灵迹，左面安排了东台、北台及其间寺庙灵迹。这就形成了一个纵横对称、重点突出、多而不乱的平稳格局。又以五台山规模宏大、范围广阔、寺庙众多，故画师们遂以鸟瞰的



佛光寺唐代弥勒彩塑

竹 音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佛光寺是五台山最早的寺宇之一,在五台县豆村乡佛光村东,距台怀镇47公里。寺宇依山就势,坐东朝西,北、东、南三面环山,面临河流,青山碧水,鸟语花香,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气候宜人,真是弘法习禅、修身养性的清修佳地。自古就有许多高僧大德至此研习经典、说法弘道。唐代时佛光寺成为五台山著名的“十大寺”之一,声誉远播国内外。因此,远在数千

里之外的敦煌莫高窟61窟中还绘有一幅面积46平方米的《五台山图》。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就是看了此图后于1937年6月费尽周折找到这座唐代古刹佛光寺。由于地处偏远,香火稀少,这座古建筑幸免于战火的浩劫,被完好的保存下来。梁先生通过精心考察,测量绘图,把佛光寺东大殿与殿内的唐代彩塑、唐代壁画和唐代题记誉为“唐代四绝”,并撰写了《记五台山佛

视角,运用远景与近景、整体与局部、重点与一般、虚幻与实写等相结合的手法,成功地反映了五台山的全貌,如对五座台顶的描写就是巍峨敦厚、气势磅礴、稳重庄严,而对其山支脉的描写则不乏挺拔屹立,陡峭秀丽;再是对十大寺尤其是大圣文殊真身、大圣文殊真身殿和万菩萨楼及解脱、法照、道义、神英等建筑、人物、情节,就予以了突出重点,特别描写,而对那些店铺、俗人、送供使等人事则是点到为止,这就给了人们一个清晰明了的感觉。

《五台山图》是以五台山的山水来组织画面的大型山水人物画。因它是以石青、石绿、赭石等天然色彩为基本色调,所以,它的色彩比较柔和平稳,给人以一种清净和谐、赏心悦目之感,具有青绿山水画的风格。总之,《五台山图》是五代时期敦煌佛教艺术的巨大成就。它

反映了五台山文殊信仰回流到祖国西部的传布情况及其地僧俗人等对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信仰热情。

参考文献:

- [1]宋·王薄撰.唐会要(卷96)[M].
- [2]宋·王薄撰.唐会要(卷67)[M].
- [3]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138)[M].1840—1841.
- [4]任继愈.唐代三教中的佛教[J].五台山研究,1988(1).
- [5]明·镇澄撰.清凉山志(卷5)[M].
- [6]清·王昶撰.金石粹编(卷113).大唐润州句容县大泉寺三门记[M].
- [7]唐·柳宗元.河东先生集(卷25).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M].
- [8]张惠明.敦煌《五台山化现图》早期底本的图像及其来源[J].敦煌研究,2000(4).
- [9]文中“□”均为字迹模糊.

收稿日期:2008-11-03